

# 序

自人类先祖相互交流伊始，社区便应运而生。小社区演变为村庄、城镇和城市，最终兴邦立国。社区规模的限制因素，主要是组织性和技术性的，而非人类自身不愿彼此融合。卫生问题和疾病挑战，以及大规模运送人和物的能力不足，都制约了城市扩张。对大规模人口管控乏术，往往会给帝国历史画上句号。但到了今天，随着人类进步，为了全人类福祉，更大的社区规模不再是天方夜谭。

我们为什么寻求接近他人？原因很简单：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都会受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称之为规模经济，其他人则称之为集聚效益，就本报告而言，我们可以称之为开放收益。

今天，我们并未准备好让整个世界变成运转良好的统一社区，但达成这一美好愿望前景可期。就如同历史上的欧洲，曾战火绵延数个世纪，又有谁会想到，如今他们大多都生活在没有边界的巨大联盟里呢？仅次于统一社区的最佳选择，就是开放；可以使我们共享世界大同益处的，就是开放。

社会的最终目标，就是增进人民福祉。这来源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或应该是——同贫困和苦难作斗争，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社会和文化福祉是通过构建法律和道德

体系来实现的，以体制机制保护个人权利，免受他人压迫，实现健康成长。经济福祉则来自于高效的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推动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毫无疑问，一个社会良性互动、文化交流互鉴、经济开放发展、思想活跃碰撞、人们自由流动的世界，必将优于一个自我封闭、战火频仍的世界。

开放是增进共同福祉的最佳方式。了解彼此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为和平共处提供了先决条件；商品和思想交流进一步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使我们不再局限于孤岛般隔绝的一个个国家之中。《世界开放报告 2022》正是推进这一目标的宝贵工具：它阐明开放收益、分析开放水平、提升开放成效。当前，国际组织在竞争力、创新潜力、透明度和腐败等影响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方面，都发布过相关指数及国家排名，但尚缺少开放度的相关排名，本报告填补了这一空白。

更令人欣喜的是，报告在构建世界开放指数时，还考虑到了社会和文化维度。这两个因素对于推动形成良好国际关系，尤为关键，却很少有经济指数将其纳入。事实上，良性的社会关系，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往来。

世界开放指数的大部分指标，都是经济指标。为消除测度量纲的不同，每个指标首先除以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总值，例如，将进口除以该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然后再赋予一个权重，以反映其在总体指数中的重要性。这些权重，是由对 41 位中国国际经济学家的问卷调查得出的，总和为 1。

在指数的三大维度中，经济维度占主导地位，权重为 0.799；社会维度的权重为 0.134，文化维度的权重为 0.067。主要的经济指标是贸易壁垒（统计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国家规模大小有何影响？

例如，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的面积，都可能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四川省和广东省之间的贸易，属于内部贸易，并不会提高开放度。但比利时和荷兰之间的贸易，却是对外贸易，两国的开放度也会提高。一国的出口除以扣除本国外的世界GDP，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不平衡。例如，比利时出口除以的基本上就是整个世界的GDP，而中国的出口则除以世界GDP的80%多。但这一方法正确与否仍有待商榷，因为中国（及美国和德国）的地区之间，通过国内贸易就可以享受开放的诸多好处，而比利时则需要进行国际贸易，才能享受这些好处。

社会维度主要以人的流动为测度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学生、游客和移民，这是一种很好的衡量方式。文化维度包括科学产出（如科学论文和专利），以及一组纯正的文化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测算的文化产品进出口。这两者被赋予的权重很低，仅为0.012或1.2%。

同社会维度一样，我希望《世界开放报告》未来能更多着墨在文化领域，赋予该维度更大权重。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一维度的权重来自于对中国专家的问卷调查。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给文化维度更高的权重，而不是0.067，毕竟这不到经济维度权重的十分之一。不过这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经济学家之间判断的差异性，同其相似性一样闻名。而且众所周知，文化因素很难被量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维度的权重如此低。

到目前为止，我的讨论都集中在世界开放指数上，是因为它测量了各国的开放度，展现了世界开放的近期变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报告各章节内容，还提供了大量世界开放领域的重要信息。例如，本年度报告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开放

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及其对贸易的影响等。

自二十世纪大规模工业化以来，开放和全球化一往无前，但最近几年却遭遇逆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次性因素造成的，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这些都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促使经贸活动回流国内。与此同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举行线上会议而无需舟车劳顿，也不再依赖昂贵的劳动力，这都使得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可以顺利回流，而不会造成大的损失。事实上，过去劳动力成本是生产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但当下其重要性日渐式微。

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对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作用的分歧，诱发了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不仅影响了国际投资合作，损害了国际供应链或国际贸易，更为不幸的是，也阻碍了人们享受同外部世界更多互动带来的好处。各国尤需认清这一真相，全力消除经济开放的分歧，扩大开放共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时代的到来，本应是解决争端的催化剂，但唯有藉之以战胜贫困和增进全人类福祉时，才堪为正当之用。

最后，我热烈祝贺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开创之举，为这本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问世感到高兴。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感兴趣的所有人，应当将本报告作为他们的标准参考书。我热切期待它的后续版本不断推出。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爵士  
伦敦经济学院皇家钦定教授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